花與葉—父親在台大醫學院

方聖平整理 (2013.8)

1947 年父親從江蘇醫學院借調來到台大醫學院的第一天，看到助教打開自來水就把頭低下去，直接就著水龍頭喝生水，驚奇不止。這在大陸上是行不通的，表示當時台灣的公共衛生比大陸好很多。台大醫學院的自來水在我小時候也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小時候也許因爲台北市的範圍小，附近都是大片的稻田，成蔭的樹木極少，總覺得那時候的夏天比全球暖化的今天還要燠熱許多，每次隨母親出門回家，就彷彿中了暑，需要坐在小凳子上把背貼著一面水泥牆哼哼唉唉半小時才恢復正常。此時母親就只跟稚齡的我說一句「心靜自然涼」，別無良方。等我入了國小，暑假的下午父親常帶我步行去他的研究室，只要一踏進生理科的邊門，就覺得沁心涼，一點也不像夏天，比現代的冷氣房舒服多了；在長長的走廊上，左邊是一間一間的房間，右邊先是上二樓的樓梯和樓梯間，然後才開始有一扇一扇的窗戶，所以愈往內走愈明亮；頭幾扇門是彭明聰教授（1917～）和黃廷飛教授（1920～2010）的房間，然後才會到達爸爸的研究室，我都會留意將腳步放輕。我一向只進入父親的研究室以及他的實驗室。這兩間房間靠窗那一面的左右兩個角落各有一個頗深的水槽，水槽裡有時候放著一籠蝦蟆，水槽上方的水龍頭是實驗室裡才會採用的規格，出水口呈圓錐形漸縮，表面還有一圈一圈的螺紋。我一進入父親的研究室，就會去開一下下水龍頭，感受一下水柱強而有力的衝擊力，以及家裡或國小的自來水都沒有的那種冰涼感。那短暫幾秒鐘的享受，就夠我撐過盛暑的整個下午，我大部分的時間會跑過醫學院一處乏人管理的大草地，去看固定拴在一個角落的一頭山羊，和守著頭羊不走開的另一頭山羊，兩頭羊都是黑色的。等我玩夠了回到父親房間時，就會去洗手，水打在手上還有點痛呢。至於醫學院的自來水爲什麼那麼涼又那麼強，對幼小的我而言，始終是個謎。

母親告訴我，父親借調來台後頭一次回到鎮江時，行李裡有一口柳條箱，非常寶貝。打開一看，裡面裝滿了香蕉。父親和外公一樣，喜歡上了台灣。父親最初會來台大，主要是因爲洪式閭教授從江蘇醫學院來到了台大醫學院擔任部聘教授，覺得台灣好，遊說父親也過來瞧瞧，不料後來洪覺得台灣雖好，國民黨不好，寧可回大陸去了。母親當時在江蘇醫學院附屬醫院擔任小兒科住院醫師，1948 年的春假前聽從外公外婆的建議，跟自己任職的醫院請了假來台待產，4 月 5 日在台大醫院難產剖腹後生下了我的哥哥方憲童，坐完月子後，母子倆又回到了鎮江，母親回醫院繼續上班。直到隔年開始聽到鎮江對岸的楊州砲聲隆隆，在外公外婆的頻頻催促之下，終於決定捨棄一切來台依親。父親回到鎮江接母親和哥哥，一起搭乘「中興輪」從上海抵達了基隆。與父母同船來台的還有我的三阿姨陸晉三女士（1921～2012），但她是來接自己留在台灣的長子，又原船返回了上海。我的三姨和三姨丈任德耀先生（1918～1998）都親共，三姨丈來碼頭殷殷送別，對父親說，台灣乃彈丸之地，早晚會被解放的，大姊、姊夫此行是多此一舉。我的三姨丈爲人熱情而內斂，質樸謙和，和外公與父親的感情都非常好。他當時正在幫宋慶齡籌組「中國福利委員會兒童劇團」，後來終身從事兒童戲劇的編劇、

導演、舞台美術、劇院管理等工作，對兒童的思想教育出力甚鉅，身後共產黨將他的半身紀念雕像和墓碑安置在上海「宋慶齡陵園」裡，爲絕無僅有的殊榮。我的三姨只比父親早走一個月，與三姨丈合葬在該園裡。生前死後都曾享受國家級待遇的三姨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苦頭吃盡，自己的么女在幼稚園裡天天聽到遠方的擴音器傳來一聲聲「打倒任德耀」的批鬥聲，三姨丈的左耳也被紅衛兵打聾了。「在台有親人」這件事想必讓他們多吃了不少苦。1995 年 9 月，我陪伴父母回到嘉興和上海探親，見到三姨和姨丈一家人，相處之後發現他們和父母的感情如同半個世紀前一樣好，三姨和姨丈儘管健康狀況都很差，卻都還保有天真憨直、原汁原味的個性與美好的價值觀，沒有顯露經歷文革扭曲的痕跡，隱而不顯的精神強韌度與寬厚的美德真令人感佩。

經歷過流亡復員的經驗，父母搭乘中興輪來台時，一廂情願地認爲內戰造成的分離不可能比抗戰還要久，財物多留在鎮江，託付給親長，唯一的隨身寶貝就是我的哥哥；可是同船的旅客明顯攜帶了過多的行李，統艙裡寸步難行，人與貨俱都超載。等到中興輪駛回上海，再下一班出發要往基隆時，就步上三個多月前「太平輪」的後塵而沉船了。世人皆知「太平輪」沉船之慘，但恐慌的時代學不了教訓，其後的「中興輪」沉船事件從未聽聞他人提起，特爲之記。父母搭乘的船班變成了國府遷台史上最後一班船，等到和家鄉能夠再通音信時，雙方在心靈上已經互爲異鄉人了。1949 年 5 月的跨海之旅，是父親一生中最詭異也最關鍵的旅程了。真是“可待追憶”而“當時惘然”。

細谷雄二教授

日據時期的台大「醫學院生理科」叫做「醫學部生理學教室」，設有「第一講座」和「第二講座」。「第一講座」自設立以來先後共有三位日籍教授前來任教。父親初來時看到講座們的照片，發現他在北平時認得的永井潛教授（1876～1957）竟先他來台擔任過第一講座（第二任，任期 1937.8-1939.8）。

父親在北平大學做進修生的那一年，學校已經有日本人的勢力進來，日方武斷的宣布，要派一位教授來講課一年，侯宗濂雖然不悅，因非壞事，也就隨他去。於是來了時任東京帝大醫學部長的永井潛教授，授課一年。當時請了清華大學外語系的日文教授來翻譯；黑板前左右各站了一位助教，永井寫完左邊，右邊就要擦黑板，寫到右邊，左邊就要擦黑板；另派兩人負責聽寫筆記，父親是其中之一；一位日籍教授上課，共五位華人伺候。父親中學時代練就了聽寫筆記的功夫，此時聽寫華語口譯，間以下一段的日語講演，覺得時間加倍從容，筆記寫得很完整，另一位筆記員無此習慣而跟不上，便放棄努力而乾陪在父親身旁。永井臨走時宴請部分協和醫學院和北平大學的醫界大老，把身爲學生的父親也一併邀請進去，算是特例，以示答謝。後來父親去了軍醫學校當助教的同時，永井來了台北帝大擔任「第一講座」兩整年。

「台北帝大醫學部生理學教室」的「第二講座」自設立之初就一直由細谷雄二教授（1897～1967）擔任。國府接收台北帝大改稱台灣大學之後，爲了因應青

黃不接的過渡期所面臨的師資匱乏，仍然留用了一批帝大時代的日籍教員，細谷雄二教授就是爲生理科留守的日籍教員，他一直等到國民黨完成全面遷台的1949 年暑假才返回日本。

1947 年父親剛來生理科時，科內同仁人數不多，彼此講閩南語，都跟細谷講日語，父親鴨子聽雷，完全狀況外；細谷留德，父親就和細谷講德語，夾雜一些英語，變成別人聽不懂他倆在講什麼；語言磨合期大家辛苦，但場面又有點詼諧。細谷見到大陸來的父親“先禮後兵”，交談之初先向父親道歉，因爲日本侵略了中國；接下來說，日本的各類科學都比中國發達進步，但是日本的生理學期刊沒有《中國生理學雜誌》地位高，他覺得不解與不平。父親答以日本軍方確實應當向中國道歉，但是細谷是位學者，毋須承擔道歉的責任；德日系統的學術期刊都用本國語發表，德國期刊用德文，日本期刊用日文；德文雖不及英文普及，但尚可，日文比德文更加不普及，故在國際上的流通受到更大的限制；《中國生理學雜誌》用英文發表，國際上的投稿和訂閱率高，流通廣，故能發揮影響力。細谷聽了父親的回答很高興，後來並將期刊英文化的建議帶回國內，廣爲實施。細谷當時在生理科仍繼續培訓博士生，父親遂加入他的團隊，接受指導。父親和細谷雖然在台大相處僅兩年，但是研究上的合作逾三年。在細谷返回日本後，父親夜夜遲歸，繼續完成實驗並負責撰寫論文，與細谷聯合發表了 3 篇論文，外加自己獨力發表的 1 篇，共 4 篇都是用英文在日本很好的的醫學期刊上發表，實踐了日本學術期刊英文化的理念，也被收入教科書中。

夜視鏡是二戰期間美國軍方的發明，但一般人並不知道有此產品。細谷利用藥物提升人眼的夜視能力，日軍藉以取得夜間作戰之優勢，故頗受日本軍方看重。舉例來說，當初日俄雙方在滿州國曾爲了邊界問題起過衝突，日軍曾在俄軍的虎視下因爲服藥提升暗適應取得優勢而順利摸黑渡河。父親與細谷的研究工作就是循著藥物對夜視能力的影響這個方向繼續發展，當時擔任講師的彭明聰教授和擔任助教的黃廷飛教授也有局部參與協助，列名作者。細谷返回日本後，先在大阪市立大學擔任教授，後獲選爲該校醫學部部長，之後又再獲選爲校長。他肯定父親的研究品質，以指導教授的身份將父親的多篇論文提送到曾爲帝大之一的「名古屋大學」審核通過，核發博士學位給父親。父親大學畢業後雖然先後從學於侯宗濂與蔡翹，但都沒有學位。因爲日本軍人侵華製造戰亂而使父親無法深造，也因爲日本教授們的審核使父親獲得博士學位，讓學歷變得完整。在此之前的 1950 年，父親也成爲細谷離台後，生理科第一位正教授。當時的父親三十餘歲；父親說他平生最用功的峰期是四十餘歲到五十來歲。

從 1947 年父親來台，到 1954 年父親擔任生理科第一任科主任止，前後長達七年的時間，生理科處在“無政府”狀態。雖然早期曾有一位東京帝大醫學博士邱德金（1893～1977）擔任副教授，講授生理學，但他在基隆開有私人診所，並且熱衷政治活動，於光復後不久就離開了，父親對他幾乎沒有印象。當時生理方面的公文來到科裡，彭明聰教授交給細谷，細谷就交給中文文筆最通順的父親，大家商量如何回覆之後，父親寫好公文，因爲科內無人執章，只好糊里糊塗地就送

了出去。等細谷回日本後，仍然無人執章，公文就由彭明聰教授和父親一齊商量後，繼續比照處理，實爲戰亂時代剛結束，過渡期方有的有趣異象。

等到 1954 年父親初任生理科主任和研究所所長時，並無所謂任期制，他一做就做了 12 年，等到有任期制時，所內同事又要他連做兩任，一任三年，共六年，所以父親擔任了 18 年的主任和所長，那真是很長的歲月。那個時代的台灣大學院校裡，許多系所主管會公器私用，利用公家資源拉幫結派搞小圈圈，內部鬥爭得烏煙瘴氣而對外毫無國際觀與競爭力，以至於一蹶不振。台大生理科能夠由三名教員而日益壯大且欣欣向榮，至今維持著良好的風氣和健康的體質，值得慶賀。

杜聰明院長與傅斯年校長

醫學院院長杜聰明教授（1893～1986）是台籍人士的驕傲。他是首位台籍醫學博士，也是台北帝大時代唯一的台籍教授。在莊長恭校長離台，傅斯年（1896～1950，校長任期 1949-1950）接任台大校長之前，杜院長兼教務長並代理過校長。杜非常擁護德日教育體制，抗拒改革，本土意識又特別強，從國府接收伊始就不太隱藏應由台籍人士主導校務院務的想法；當時的他在這兩方面都比其他人更不願妥協。可是當局正積極推行教育制度英美化（例如：整頓各研究室歸併成系所，廢除原隸屬於各研究室底下的各個圖書室，匯集成立各系所共用的圖書館），加以新敗之餘的統治者安全感不足，力圖削弱地方意識以鞏固中央領導權；台大校方遂長期承受壓力，要將醫學院院長換人做，連曾在報端痛批宋子文，被形容爲與國民黨“親而不近，疏而不離”的傅斯年校長都覺得撤換杜院長不失爲一兩便之舉。

依照當時的國策，醫科的每個班要收 20 名僑生；大陸過來的學生當中混有職業學生；本地生只會說閩南語；醫學院的訓導分處主任是苦差事，沒有人要做。杜聰明院長（第一任任期 1945.12-1947.3；第三任任期 1948.7-1953.7）在院務會議上通過，要聽不懂閩南語的父親擔任訓導分處主任。父親並不怎麼擔心僑生或職業學生的問題，可是在那個國語尚未普及的年代裡，他背負了身爲外省人的原罪，聽不懂閩南語，無法與學生溝通，如何做得好訓導主任？父親憂心不已，可是這是院務會議的決定，父親想來想去實在沒有辦法，就在晚飯後去到福州街的校長官邸，告訴門房，他沒有預約，但有事要見校長。抽著煙斗的傅斯年接見了父親，聽明了原委，思索了一陣後，建議父親寫一份辭「醫學院訓導分處主任」的辭呈，但不呈院方，而直接呈給校長。在父親道謝告辭之際，傅斯年說了，「我剛剛替你解決了一個難題，現在換成我有一個難題，要來問問你。我想把杜聰明院長換掉，你覺得怎麼樣？」父親利用在玄關換鞋子繫鞋帶的時間思索了一下，直起身來回覆道：「我覺得不好」。如何不好呢？父親回答道：把杜院長換下來，接替他的人如果比他還強，他會服氣；可是眼前有實力取代他的人都在大陸，這些人要不就是不肯來，請不動，要不就是飛機已經沒辦法去接了，想來也來不了；如果換一個不如杜的人，那還不如不換。傅校長之後派杜院長赴美國與歐洲一

年，參觀考察各大學，而以美國爲重點，希望杜能感受英美學制的好處。杜返國後在重要場合演講，仍然對德日制度一往情深，演講內容觸怒教育部。

杜院長後來是在錢思亮校長（1908～1983；任期 1951.3-1970.6）任內卸下醫學院院長職務。杜堅守立場，強硬到底，不願妥協的個性在這個過程裡表露無遺。據說錢校長登門拜訪杜院長，表示長期承受教育部的壓力，想請杜主動辭去院長職務，但始終遭杜堅拒。錢校長只好在某一回的高階主管行政會報上宣布，感謝杜院長多年的辛勞，如今他口頭辭職，不得已要卸任了。杜立刻站起來發言，表示他沒有意願辭職。會場靜默一兩分鐘後，時任教務長的沈剛伯教授站起來說，此事已經懸了許久，我們實在只好鼓掌感謝杜院長，然後大家鼓掌。杜遂離開台大前往高雄，與陳啓川先生（1899～1993）在一年後的 1954 年，創辦了台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高雄醫學院」（即今日的「高雄醫學大學」之前身），並擔任首任院長（任期 1954-1966）。

據說杜院長和我的外公原有希望結成兒女親家。我外婆連生了六個女兒，生到我的小阿姨時，我的外曾祖父已經懶得爲孫女取名字了。1932 年一月底到三月初發生了一二八事變，日軍從長江砲轟上海，三月下旬我唯一的舅舅出生了；彷彿因爲砲聲震動天地，終於將一名男孫給震來了，外曾祖父遂將舅舅取名爲「陸震來」；那時一歲的小阿姨仍然沒有名字，外曾祖父就隨口取「跟隨前面五個姊姊」的意思，以嘉興話「隨五」的諧音，將小阿姨取名爲「粹五」。來到台灣之後，外公替小阿姨辦「建國中學」的入學手續時，又另取嘉興話的別個諧音「瑞娥」做她的名字。等到小阿姨進入台大物理系就讀時，杜家和陸家是青田街的鄰居，杜院長的公子似乎對瑞娥阿姨有過那麼一點點意思，怎奈杜院長夫人的姪兒是瑞娥阿姨同系高一屆的學長，更加有機會親近，在瑞娥阿姨畢業時訂了婚陪她一起出國進修。後來杜院長見到父親，曾半開玩笑說，現在我們是姻親了。杜院長的書法很好，寫過一幅條幅送給父親。

我的六姨初中時知道父親在學德文，問：姊夫姊夫，德文的“How do you do”怎麼說？父親教她：“Ich bin sehr schön”。直到六姨出國進修自己學了德文方知上當。父親教的是“I am very beautiful”。

李鎮源教授

雖然彭明聰教授和黃廷飛教授與父親在研究方面時有合作，也會彼此互贈自己新發表的論文抽印本，出國進修期間也會互相通信，但離開學校幾乎沒有互相拜訪的例子。和父親在校外生活中仍稍有互動的台籍同事似乎只有兩位。一位是細谷的學生，時任助教的張鎮教授。張鎮見到父親特別投緣，常拉著父親到圖書室裡講自己生活裡的煩惱，聽取父親的建議，兩家也曾互相探望過。張後來前往高雄醫學院協助杜院長創設該校的生理科。他過世得很早。第二位與父親關係密切的台籍同事就是藥理學科的李鎮源教授（1915～2001）。李教授曾是杜院長的研究助理，臨事脾氣和杜院長一樣擇善固執，但平日非常溫和，父親形容他“謙

和耿直、不善辭令、處事認真、堅守原則”。根據藥理學科蔡明正教授的形容，李伯伯和父親能在一起“是一個奇異的組合”。

父親於 1947 年剛來台大時，「生理學研究所」剛剛成立，生理、藥理、生化並不分家，而是所內的三個組。生理組人少，幸有彭明聰教授和黃廷飛教授分別從藥理組和生化組轉來支援。藥理組的李伯伯和生理組的父親算是同一個所裡的同事，或許因此而有了觀察父親的機會，亦未可知。父親和李伯伯有一回和眾人同往東京參加研討會，李伯伯私下告訴父親，他和一位台獨人士約在某個十字路口見面，要父親陪他前往踐約，父親也就陪他去了。當時他倆也稱不上多麼熟，怎麼就如此信任父親，實在想不通。

1962 年，我們家附近的盛慶琭教授全家遷往加拿大，李伯伯一家就搬進了空出來的宿舍，與我們家成爲間隔了一戶的鄰居。所謂「君子周而不比」以及「群而不黨」，很能用來描述李伯伯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在實驗診斷科任教的李伯母偶爾和母親在巷弄間相遇，總會駐足親切交談許久，散發溫馨的氣氛，但兩家之間並不登門走動。我幼時見到李伯伯來到家中客廳坐下來和父親談事情的次數恐怕總共只有一兩回，另有三兩回是爲了送「胡乃元小提琴演奏會」的入場券，按個門鈴給了券就走（胡乃元是他的親外甥）。唯有一次印象特別深刻，李伯伯晚間來找父親，情緒有點激動地進了客廳坐下，表示他一定要阻擋一樁已成定局的事情。原來他認爲某位教授醫生收病患紅包，無論如何不應當讓他擔任醫院院長。當時李伯伯已經卸下一切行政職務，距離退休三年，距離蔣經國宣布台灣解嚴四年。儘管這樁人事案本身的是非與輕重可能有多種角度來看待，李伯伯的這項舉動除了貫徹自己擔任醫學院院長時期（1972- 1978）針對「醫學院教授兼差、開業、收紅包」等風氣進行改革的決心，也在那個長期壓抑不敢直言的年代裡發揮了正面的象徵意義；他告訴台灣社會，知識份子應當恢復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發揮清議的作用；他提前呼應了社會潛藏的渴望。

李伯伯另一回慎重其事地登門拜訪父親，則是爲了我的緣故。我去到海外，指導教授曾志朗博士介紹我訂閱《華僑日報》。一來我知道這類報紙經費不充裕，二來在該報經常發表文章的秦松先生是我就讀「女師附小」五、六年級時的美術老師；我出於贊助和念舊的心情訂閱了。我有不爲人知的、輕微的閱讀困難，閱讀速度奇慢無比，英文論文都讀不完了，根本沒有餘力去讀那些報紙。有兩位台灣來的男同學每週都來我的分租公寓裡看免費的報紙，看得極認真仔細，每一份都不放過，然後還打我的小報告。我是 1977 年秋出國讀書的，1978 年在海外聽說父親獲選爲中研院院士。我訂閱《華僑日報》的案子不知何故轉到當時擔任中研院院長的錢思亮前校長手上，錢院長探得李鎮源院士和父親關係親，於是李伯伯拿著公文夜訪父親，父親遂前往中研院和院長秘書聊了半小時。因爲我 1982 年能到新竹清華大學任教，想必是銷案了。我這個做女兒的著實讓父親擔憂傷神了。許多無端被打小報告的人並沒有一位院士父親，不知他們的命運如何。

父親得年 99，來台之時 33 歲，在台灣度過了三分之二個人生。「君子之交

淡如水。」李鎮源教授在世之時對父親無條件的信任和淡遠溫厚的友誼長存父親心底與記憶裡，是父親離鄉之後的大半生裡無可取代的支柱與安慰。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

「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很能用來描述台灣光復初期的高等教育與學術。不只台大生理科師資不足，全台灣的醫學院生理學師資嚴重缺少，還多靠台大的老師去支援。父親和同事去幫忙上過生理學的大專院校，從北到南計九所學校；包括柳安昌教授召他去支援的國防醫學院，以及遠在南部的高雄醫學院；那時父親週五坐夜車去高雄、週六上完課再坐夜車、週日早上才回得了家，好累好累。至於台大生理科本身的師資不足，又當如何呢？

1954 年父親擔任生理科主任兼研究所所長，第一年就聘了客座教授，做爲師資不足年代裡增開課程和提升研究生訓練的重要策略。第一位客座教授 T. H. Allen 博士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生理科，他當時的研究興趣是「血量（blood volume）」。血量的研究對於需要爲病患輸血的臨床醫學而言，有其重要性，父親身爲主任，不好意思去告訴他，所內同仁對這個研究課題不重視或不感興趣。適逢公共衛生系的陳拱北教授剛從明尼蘇達大學回來，陳的研究興趣是「體脂量」，血量和體脂都和人體代謝有關係。父親遂問 Allen 是否願意做「體脂和血量的關係」，Allen 欣然同意，於是哥大生理系、台大生理系、台大公共衛生學系三個單位的成員一起努力了三年。雖然 Allen 只來台半年，但他離開後研究工作繼續進行。後來 Allen 和彭明聰、陳拱北、黃廷飛、張鎮及父親聯合發表了三篇論文，都刊登在美國的 Metabolism 期刊上。那三篇論文使得 Allen 博士被美國陸軍的醫學中心高薪挖角，擔任生理學主任，繼又被美國空軍航空醫學校挖角，去擔任生理學主任。從此台大生理科和哥大生理科建立了長期的良好關係，雙方都是有實力的團隊，相得益彰。1956 年彭明聰教授率先去到哥大王世濬教授（1910～1993）實驗室做研究，王教授隨即於 1958 年來台大客座，並於 1961 年幫助生理科獲贈一台儀器。父親也經常利用國科會短期學人訪問的補助，邀請王教授等人回國做系列演講，使師生獲益。父親自己也在 1960 年和 1968 年往哥大醫學中心客座；而台大生理科畢業生亦多送往該校就讀，包括後來在哥大任教並成爲院士的錢煦博士。

父親擔任科主任的 18 年裡，共請來 7 位客座教授，其中 5 位來自哥大生理學科（其餘三位是錢煦、王雪華、胡建華；另高逢田教授來自紐約州立大學、黃祺章教授來自路易維爾大學），且多爲華人。哥大爲美國十大名校之一，此一措施鞏固了單位與單位的關係，力量強過零星個人的關係。

父母親和王世濬夫婦倆也建立了長逾四十年的溫厚情誼。王夫人郭煥煒女士是協和醫院護理學校的校友，該校是大學畢業後再讀四年護理；她畢業後就去了美國，始終非常關心兩岸的護理教育，長期回饋與付出，不遺餘力。王夫人寫信都用英文，郵箋裡寫得密密麻麻，空間總是不夠用，每年都要通上好幾封信。王

教授是林可勝博士的學生，也是 1958 年第二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不止生前念茲在茲要爲台灣生理學界和神經科學界出力，身後財產也在其夫人的用心推動下在台設立基金會，繼續朝此目標邁進。他兩夫妻的表現反映了許多他們那個時代裡自大陸至海外奮鬥有成的華人學者的心情。那時期的美國種族歧視的情況比現在嚴重，王教授辛苦做到教授，對於台灣去的學生和訪問教授都特別照顧。

父親在我出國唸書的前夕，在錄音機前對我說了幾句話，主要是告訴我：做研究工作時，合作強於單打獨鬥，故應注重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我現在回想，深深覺得父親天生就能身體力行這一點，因爲所有傳聞中架子大的人好像都蠻能與他共事；例如柳安昌教授和父親來台後於 1951 年至 1958 年間聯合發表了十篇論文。無論親疏遠近或有無交情，父親永遠懷抱善意熱心助人、不嫉妒、不與人爭功；別人做了小動作，他就裝傻，若無其事；不記恨、不報復；他又有躲開算計的本事，因爲不存貪念，從來沒有落入過人生的陷阱。

早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海外多而島內少。彭明聰教授和父親能夠同年選上院士，沒有海外的助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以哥大生理科爲核心的一群院士熱心支持，積極主動去發揮影響力，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因爲院士選舉就像選美一樣，燕瘦環肥，一樣的美，美得不一樣，哪裡真的能排名。能夠獲得提名已經很榮耀，通常都是同一個等級的學者，選上了不能排除運氣的成分，沒選上也不見得真的輸給人家；選上與沒選上，學術實力的差距或許真的明顯，學術人脈的差別不可謂不關鍵。基於對學術的真誠而與同行同好長期互動，漫無機心自然形成的人脈，方屬難得。

進修與研究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 41 歲，我從小見到的父親傍晚回家後就不出門了。晚餐之後，遇事多先由母親現身應付處理，但父親偶爾也會在屋裡走動，需要他時他也都在，故我完全不知道父親在臥房裡關上門後，都在書櫃與書桌構成的小角落裡專心用功，等我發覺醒悟時，我已經在清大任教了，深感錯失耳濡目染默化受教的機會。我一輩子渾渾噩噩，不知道什麼才叫做“用功”。等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後，晚間經常溜去研究室，沒有在家陪伴孩子，深感有虧母職。父親的定力，與被打斷之後又可以瞬間凝聚的、高度的專注力令我深深佩服。或許這就是運動員在熱鬧、充滿紛擾的運動場上鍛鍊出來的排除雜訊的能力。

1952 年父親赴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進修，跟從 van Liere 教授做了一學期的研究，共同發表了三篇論文，是父親在美國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的開始。1953 年初，父親轉往俄亥俄州立大學一學期，跟從 Hitchcock 教授從事航空生理學研究，與另一位訪問研究員，美國海軍航空醫學院的 Hall 教官同組，做快速減壓的實驗。從此父親和 Hall 以及黃廷飛教授聯合發表過 8 篇論文。Hall 不僅終身和父親維持友誼，他的一個兒子只要路過台灣，必定來看望父親。有一回小 Hall 先生來新竹和我見面，聊了許久。他小學時期成績特差，被各班導師們踢來踢去，最

後送到特殊教育班。某日他問老師，楓樹是否爲“外來種”？老師疑心他只是學舌，根本不明白罕用詞“外來種”的意思，與他對談一番，赫然發現他實在聰明，不該被編在特教班。原來小 Hall 先生閱讀時沒辦法逐行唸，總是跳行，以致於語句不銜接，覺得課文不知所云。專家一方面用閱讀機一次只呈現一行，幫助他順利閱讀，一方面讓他透過大量練習，以後天的策略彌補先天的不足。等到我認得他時，他已經全世界飛來飛去，代表公司專門負責和衛星工廠簽訂契約，閱讀厚厚的法律文件毫無困難了。小 Hall 先生現在年逾六十，表示美國的特殊教育很早以前就普及於各所學校，而台灣還在起步階段，亟需政府加強投資。

父親從俄亥俄州就近前往紐約參觀，走在路上口渴，就去飲水機喝水，立刻有白人對他搖手，說：That’s for color! 原來連飲水機都是黑人和白人分開的。雖然黃種人沒有完全被當成黑人對待，但仍能感受得到潛藏的壓力。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是抽香菸的，也抽過煙斗，後來之所以戒掉了，是因爲他 1960 年去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時聽了一場演講，提到一個人連抽三根煙的缺氧程度，相當於人體在八千英尺高度的缺氧程度；他聽完演講後，就把手邊剩下的半條煙扔了，從此戒煙了。

台灣早年雖然遍地野狗，但是大型狗很罕見。父親回憶當年哥大實驗室的技師牽了一條長毛狗進來，那狗立刻搖著尾巴人立起來舔父親的臉，或許牠有英國古代牧羊犬的血統。父親頓時心下不忍，又不得不犧牲牠，只好將麻藥放在牛奶裡餵牠，自己去校園裡散步一圈回來，狗已睡倒，方開始進行實驗。父親細數他所犧牲過的實驗動物，計十一種，所犧牲過的狗逾二百隻。每當受到人生磨難時，父母只好自我調侃，說是因爲父親和祖父都殺生過多而遭到報應。

1966 年以前，父親的論文所發表的國際期刊是一般生理學或眼科相關的期刊。1966 年，他連續發表了兩篇論文在美國的 Aerospace Medicine 期刊上。這份期刊是由「美國航空太空醫學會」所出版的。該學會擁有將近 80 個國籍的會員，會長不一定是美國人，爲一國際性組織。該學會的刊物是當時全世界僅有之航空太空醫學期刊。父親個人首度在航太領域的醫學期刊上發表的同時，他也成爲在該期刊上發表論文的首位華人，開啓了新的里程碑。之後父親就是該份期刊發表的常客了。

關於父親在快速減壓和缺氧方面所做的一系列的研究，已經故逝的劉華茂教授所寫的〈方懷時教授傳略〉裡，有精簡且富條理的介紹。劉教授是父親早年的學生，父親稱他“小劉”。1968 年父親帶著母親前往哥大醫學中心擔任客座教授時，初中一年級的我去伯父家寄住，平生頭一次嚐到搬家的滋味，坐在三輪馬達車後的小書桌和行李堆上，興奮中摻雜著一絲害怕，又不敢表露情緒。“小劉”夫婦則住進我們紹興南街的家裡幫忙照顧一切。我回去探訪時，我們家的狗特別興奮。我驚訝的發現那隻黑狗的毛變得黝亮無比！劉教授告訴我，他都餵牠吃牛肉。母親一向將狗當作廚餘處理機，給狗吃人吃剩的、對狗而言過鹹的食物。多虧了劉教授，那一年是那隻狗一生裡最幸福的時光了。劉華茂教授曾和父親聯合

發表過將近二十篇論文，合作期間長逾二十載，已過世多年。

父親第二次去哥大回來之後，與當年還是助教的陳朝峯教授倆親自繪圖，雇人打造了一座低壓艙，主艙之外還有副艙。主艙很大，可以坐好幾個人進去，感受人體在高空中的生理變化；副艙作爲附件，體積小很多，可以放老鼠、兔子、蝦蟆等小動物進去。如果把副艙接上了主艙，兩艙之間用一層膜加以阻隔，然後把龐大的主艙抽成接近真空，可以模擬飛機在高空中艙內（副艙）和艙外（主艙）氣壓的懸殊差異。此時如果將兩艙之間的膜刺破，就彷彿高空之中的飛機在意外事件中突然失落了艙門一般。此時副艙內的空氣快速往主艙擴散，動物會在 0.02 秒間遭受由地面驟升至 7 萬呎高空的快速減壓；實驗的目的就是觀察動物有此遭遇後的肺出血、白內障等種種生理變化。父親說，過度肥胖的老鼠胸腔壁上脂肪較厚，肺臟快速擴大打到胸壁上，肺出血的情況沒有正常老鼠那樣嚴重。父親一直希望客機能夠設置分隔艙，艙間裝設安全閥，保護高空中的乘客在意外事件中免受快速減壓的各類傷害。可惜這個想法至今未能落實與推廣。

當初我出國唸書前，父親將他珍愛的德製 Tippa 老牌打字機送給我，希望對我的學業有所幫助。父親目前留下來的原稿，中文稿都是用手寫，英文稿多是傳統的打字稿。世界變得真快，等我回到清華數年間，個人電腦變得非常普及，我偶爾有機會幫父親的論文或是雜文用電腦打字，用電郵交稿。父親的原稿喜歡用鉛筆寫，因爲容易修改之外，影印之後的字跡非常黑，往往比原稿還要清晰。他把原稿存底，影印稿交給我打字，不只一回對我說，「這大概是我最後一篇文章了」；不久之後又說，「這篇真的是我最後一篇了」。直到退休後許久，終於封筆了，而他的視力也變差了。

1985 年父親退休時，生理科同仁特意在紀念牌上打造一枚半立體的金質低壓艙送給父親，令父親感動萬分，連我旁觀之下也深感光榮。父親自退休到離世，其間的 27 年，一直把生理科當成家，幾乎天天都去生理科報到。醫學院的同事見到退休後的父親都非常親切，午餐時和他無話不談，這帶給他莫大的安慰，是他健康長壽的一大主因。一直到父親往生逾一年的今天，母親和我仍然持續受到生理科同仁的照顧和支持，內心的感激，言語無法形容。台大醫學院真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地方！

資料主要來源

方懷時：〈2009 年 11 月 12 日受訪錄音稿〉（未發表）。
方懷時：〈2009 年 12 月 3 日受訪錄音稿〉（未發表）。
方懷時：〈2009 年 12 月 17 日受訪錄音稿〉（未發表）。
Internet.

圖 1：1947 年攝於「生理學研究室」。中坐者為細谷雄二教授，立者由左至右為彭明聰、佚名者二人、張鎮、黃廷飛、朱威廉。

圖 2：前排坐者左起方懷時、細谷雄二、彭明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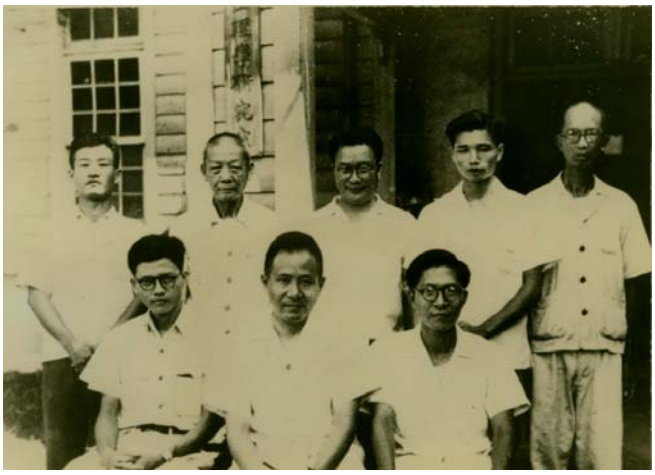

圖 3：1953 年攝於生理學科木樓前。前排左起起：黃廷飛、方懷時、彭明聰，後排左起：李憲章、王阿秋、張鎮、蔡世聰、吳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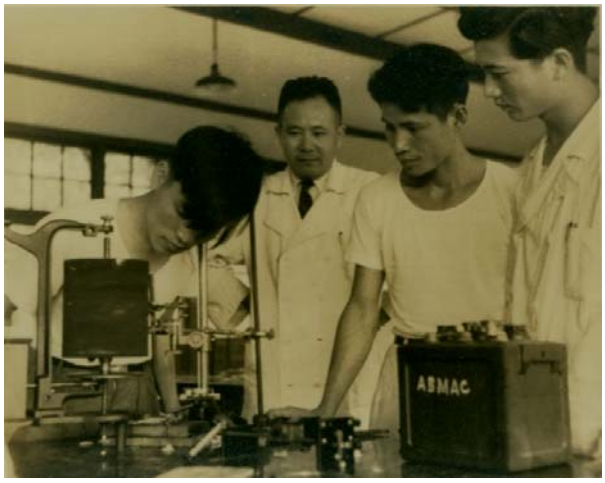

圖 4：父親（左二）早年指導研究生觀察青蛙心肌之特性。

圖 5：父親剛來台時，街道上載貨都靠黃牛車，出門以三輪車代步。父親童心未泯，向三輪車伕借了斗笠留影。

圖 6：1954 年台大生理科首位客座教授 Allen 來訪，生理組同仁陪同遊台北。藥理組的李鎮源教授是當時少數樂意參與科內別組活動的教授，故身為科主任及所長的父親總是開心的邀約他。後排：李鎮源；前排左起：張鎮、彭明聰、黃廷飛、方懷時、Allen。

NEWS OF MEMBERS

Dr. Fang Visits Brooks AFB

Dr. Hwai Sze Fang, left, and his wife, also an M.D., are shown with Dr. Thomas H. Allen, Chief of the Physiology Divis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School of Aerospace Medicine, Brooks AFB, Texas, during a visit to San Antonio. Dr. Fang,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Formosa, recently completed a one year exchange professorship at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While visiting the School of Aerospace Medicine, he joined the Aerospace Physiologists Section of the Aerospace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became the first member from an allied nation.

圖 7：1970 年父母返台前夕，Allen 博士招待父母參觀美國空軍航空醫學校，父親並加入美國航空醫學學會的航空生理學組，成為第一位外國人會員。

圖 8：1988 年 7 月 11 日中研院活動，母親為李鎮源夫婦和父親留影於忠信飯店早餐後。

圖 9：李鎮源夫婦與父母親在 1997 年 3 月 5 日參加台大退休教職員自強活動，於冬山鄉休閒農場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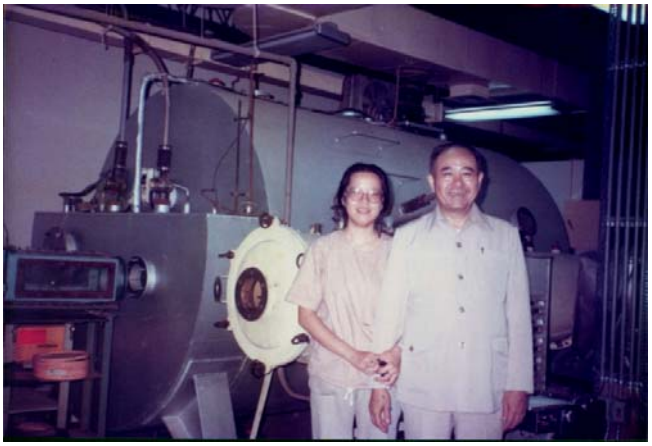

圖 10：母親為父親與我在比人還高的低壓艙前留影。當時低壓艙已從第一號館遷出，暫放於體育館內。父親對此低壓艙甚為珍愛，仍然保留著當初的設計圖。

圖 11：為了興建「基礎醫學大樓」，台大生理科舊址「第一號館」於 1983 年 3 月間拆除。為了搬移大體積的低壓艙而擴大窗口（父親肩後的缺口），將該艙移至其他地點暫時安置。

圖 12：父親退休時生理科同仁打造金質低壓艙做成「精研生理，學究太空」紀念牌送給父親，如此可愛的心思令父親感到無比溫暖。

圖 13：父親代理醫學院院長期間，是醫學院新大樓整建委員會的一員，阻擋了業界的關說，深以新大樓的品質為傲。此圖背景為施工中的新大樓。

台灣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研教之回顧

方懷時

我於 1947 年初到台大醫學院工作，轉眼間距今已逾半個世紀。當年日籍生理學教授細谷雄二先生尚留校任教。細谷教授係研究視網膜感光物質之著名學者，他於 1949 年返日後，曾任大阪市立大學校長。記得我初到醫學院，每到中午，大家都到細谷教授的辦公室內一同吃自帶的便當。午餐時談天的範圍很廣，時有涉及研教。現在回想，我認爲這是一種很好的傳統習慣。同仁們每天都有相互溝通的機會，對人際關係及研教工作都有助益。這種午時共餐與聚談的習慣約持續十年，等到生理學科自舊址（建在相當於現在的體育館的兩層樓木屋）遷到一號館（位在相當於現在基礎醫學大樓之大廳），大家才各自午膳。在基礎醫學大樓興建之前，一號館和一部分之二號館均被拆除，很多基礎醫學學科都暫時擠在臨時改成兩層樓的體育館內。大家在克難的情況下，繼續研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各地經濟蕭條、物資匱乏，當時各校所獲之教育及研究經費很少。教育部爲了配合國策，台大醫學院每年均額外增收僑生 20 名，故醫科每班學生約 100 人。大班上課，尚無困難，但百人同時進行生理學實驗，就感不易應付。那時生理學實驗結果大多紀錄於記紋鼓（Kymograph）的燻煙紙上，很不方便。直到 1961 年，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王世濬教授建議 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CMB）捐助一台多導儀（Grass polygraph）及各種附件供我們使用。這台生理學科擁有的第一台多導儀，內部雖尚未使用電晶體而僅用真空管，但其功用很好。飲水思源，深以爲感。後來台灣經濟繁榮，研教經費漸增，以前我們所珍視的多導儀早已被普遍應用。近三十年來，師生於生理學實驗時，早已將多導儀取代記紋鼓。且同仁們可向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其他的研究設備亦大量增加。

本院除醫學系之外，尚有不少其他學系也將生理學列爲必修科目，故需另外開班講授，學生人數亦多。但生理學研究所之學生則較少。生理學研究所成立於 1947 年，初期包括生理、生化及藥理三組，後來此三組分別成立了三個研究所。歷屆任生理學研究所（及生理學科）主任之先後順序爲方懷時、彭明聰、黃廷飛、傅祖慶、陳朝峰、蔡元奮及賴義隆等教授。自 1953 年至 1967 年間，承 CMB 與國科會之支持，邀請到不少生理學客座教授，依到校之先後順序爲 T. H. Allen、高逢田、王世濬、錢煦（本校傑出校友）及王雪華等五位教授，任期均係半年。其中除高逢田教授來自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owntown Medical Center 外，其餘四位教授均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那時他們對台大生理學研究所做出極大之貢獻，令人感佩。以王世濬教授爲例，他在台時，曾捐贈 Stereotaxic instrument、Grass stimulator、手術儀器及研究費用給生理學科所；他返回紐約後，先後協助三位同仁赴哥大醫學中心進修（其中一位同仁惜因故未能成行）；他嚴謹求實，熱心助人，不僅是一位著名之神經生理學者，也是一位熱忱的教育家。王教授於 1993 年逝世，令人懷念。

生理學科所同仁雖人數不多，但研究範圍相當廣泛，涉及神經生理學與行爲生理學、減壓低氧與腎臟生理學、心臟血管生理學、呼吸生理學、內分泌生理學、以及胃腸生理學。同仁們經多年之研探，有不少人獲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傑出獎與其他多種學術榮譽，研究成果雖獲肯定，但仍有向理想之目標成長之廣大空間。時光飛逝，老一輩退休而由盛壯者取代，生理學學門的整體研究水平亦大有提升，欣見後繼者之研教業績頗受學界肯定，時受獎勵，令人振奮。唯生命的奧秘是一項沒有盡頭的探索，若單打獨鬥能力必然有限，須群體合作才會更有力量。俗云：「任重而道遠」，在這個時代裡，路要行得遠，尤其依賴研究團隊發揮合作精神。願以此與同仁共勉。

本文原刊載於《醫學教育通訊》（2000 年，第 8 期），頁 150-151。

1950 年代之生理學實驗室共有 20 張實驗桌，足可容納 100 人。當時多導儀尚未問世，均用記紋鼓作為記錄器。